

名言文集

第一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石言文集

第一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言文集/胡石言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3

ISBN 7-5033-1318-8

I. 石… II. 胡…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6669 号

书 名: 石 言 文 集

作 者: 胡石言

责任编辑: 卢 琳

装帧设计: 张 翎

责任校对: 吴 汇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三河艺文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1183 千字

印 张: 41.125

插 页: 14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318-8/I·1141

定 价: 98.00 元(全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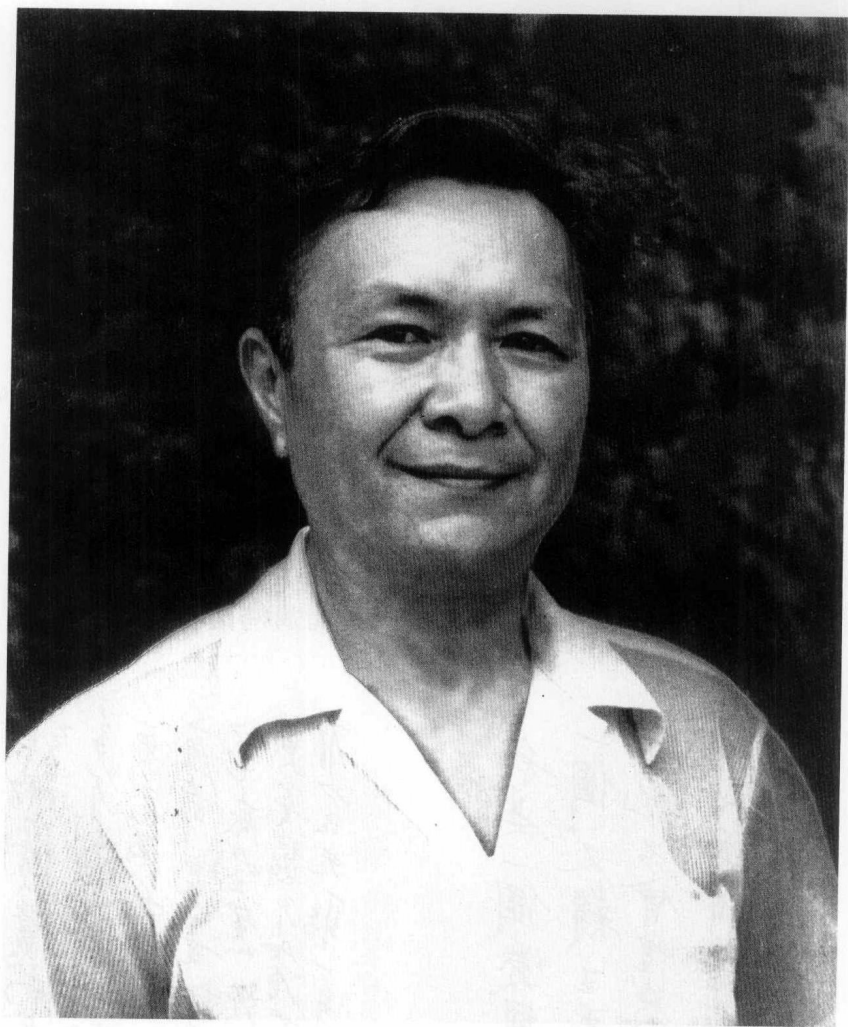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石言, 1924年生于浙江平湖。中国作协理事,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1942年石言弃学从军, 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为一个军队知识分子, 他以笔为武器, 于战争年代里为部队编写《战斗报》; 于和平年代里以军队素材为主撰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代表作有小说《柳堡的故事》、《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等。后与人合作将《柳堡的故事》改编为同名电影; 小说则被译成英、德、匈、印等国文字在国外出版。1980年从事陈毅元帅史传的编写, 主持写作了《陈毅传》和10卷《陈毅文学传记》。

作为对中国军事文学卓有贡献的作家, 石言的生平及主要作品收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摄于 1956 年

注：卿，指妻子余金芬。鸡犬，指属鸡的女儿和属犬的儿子。

此生所得四時春
彈雨驚風而亦贏
多有愚夫不及我
更元玉女可知卿
座前良書抗鸡犬
笔底咍然笑鬼神
更長出牙虎虎日
有官无恥一身輕

自勵詩

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更是一個「人類主義」者。不會消沉，不會惶惑，只要我的所作所為有益于提高人類的素質。

丁凡言
一九六〇

1953 年与妻子余金芬
摄于南京玄武湖畔。



1976 年摄于南京中山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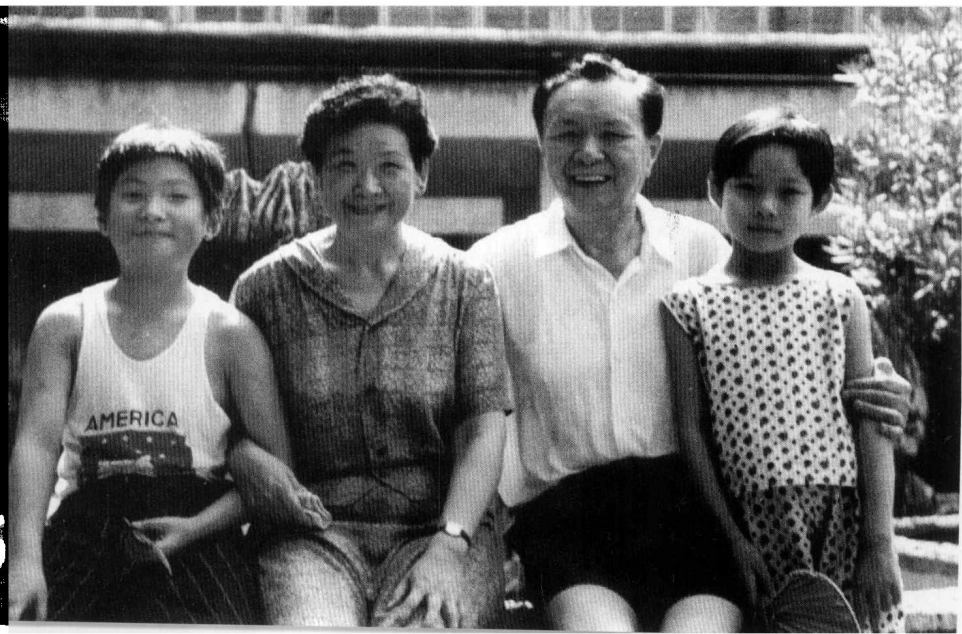


与妻子余金芬、
女儿胡月、儿子胡朋
合影，摄于1962年。

“文革”结束后，石言重新恢复了部队作家的的工作。1982年携妻与同年考上大学的女儿、儿子在上海锦江饭店合影。



1994年8月，石言患病住院治疗，至今未愈。这是他入院后与妻子、外孙和孙女的合影。



序

徐怀中

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有过这样的话,说卫国战争期间,一切为了取得战争胜利,文学作品带有一些宣传口号式的东西,虽不能说理所应当,却是完全可以认同的。进入和平年代,如果仍然照此办理,未免过于看轻了文学,无论如何是不能原谅的(大意)。肖洛霍夫呼吁文学创作要有一个彻底的战略性转变,那就是回归文学固有的规律性和特殊性。石言的短篇小说《柳堡的故事》,恰好可以印证肖洛霍夫这一番言语。这篇小说作于1949年10月26日,我们共和国建成还不到一个月,也就是说,刚刚跨进和平年代的门槛,石言便抖落一身硝烟,恭恭敬敬向读者捧出了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或许不难察觉到作者笔端的某种拘泥。但并不因此使我对当年读到这篇小说时那种扑面而来的清新之感有所减弱。石言很善于在尖锐复杂的金戈铁马格局当中,从容不迫地网织一个富于青春气息的恋情故事,呼唤着钢铁般的豪壮之气,又希望曲尽人间温情。战争年代很少接触到文学的读者,在这里领略到,原来文学竟是如此生意盎然,竟是如此开阔深远,竟是如此奔放自由,竟是如此……《柳堡的故事》拍成电影,无限地扩大了小说的覆盖面,无限地延伸了小说的生命力。一曲《九九艳阳天》唱遍长城内外,唱彻了黄河长江。“十八岁的哥哥要把军来参”,成为一代青少年追求的人生梦想,陶玉玲扮演的二妹子,作为一位纯情甜美的少女形象,在电影艺术人物画廊里占据了一个显要位置。实在说来,小说《柳堡的故事》应该被列入新中国文学报晓之作的排行榜。同正面反映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史和礼赞英雄主义的作品相比,这篇小说多少偏离了主流,所以并没有得到更为恰切更为充分也更为公正的评价,每当气候不好,更会遭到贬斥。这倒也罢了,赢得了众多读者,便是一切了。

石言作为一名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严正的行进方队中,他必须学会

保持队形,不得错乱了步伐。政治思想上的高度严谨,已经成为他数十年风雨历程中的自觉要求。作家们多不屑于谈及政治,石言却毫不隐讳地说:“我关心政治超过关心文艺。”而另一方面,石言又是一个热情活跃的人,一个思维方式开放的人,一个活得十分洒脱的人。给我的印象,正是有着明显反差的这样两个不同侧面相融会,构成了这位军旅作家一以贯之的人生姿态。石言的为文亦复如是,他注重从全局上有所把握,艺术上则只管放飞自己。如同在完成一幅草书,任由自己的性情,挥洒自如,无碍无羁,却总还是在一定的法度之中。石言的创作始终稳定在水平线以上,且一篇一篇都不同的探求。新时期复出不久,又迎来了一个金秋季节,他以《漆黑的羽毛》和《秋雪湖之恋》,相继获得1982年和1983年两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者时年已近花甲,老树枝头,梅开二度,也称得上是一道景观了。

石言早已有计划要攻长篇,却迟迟未见他进入临战状态。他带领南京军区一个强大的作家班子,共同在撰写《陈毅传》和《陈毅文学传记》。石言很乐意来主持这一项重大的文学工程,他和传记组同志,都热切地希望把他们对陈毅元帅的敬仰和亲近浇铸在字里行间。这项工程前后持续了十多年,在石言文学生涯中,这段时间应该独立划作一个阶段。共12卷近200万字长篇系列传记,一部分是由他执笔撰写,或是参与撰写,或是经他修改润色过的,为军旅传记文学的这一次大面积丰收,他付出艰辛劳动,倾注了极大心力。正因此石言的长篇始终未能动笔。但他并不以为是被耽误了,他未来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陈老总,他以十多年时间投入《陈毅文学传记》,也不妨说是把他的长篇准备期延长了十多年,也由此大大增加了这部小说的成功系数。石言曾向我披露过他腹稿中有关陈老总形象的一些构思片段和史料背景,令我大开眼界。我们在这里预测一部未经动笔的作品如何如何,并无实际意义,不过我分明感觉到了,如果这部小说得以面世,读者将会受到怎样的强力震撼。我只能说,遗憾,遗憾!

报载一位丈夫昏迷不醒27年了,他的妻子朝天每日在他病床前轻声唱着他最喜爱的一首歌。奇迹出现了,唱着唱着,居然让她把丈夫给召唤回来了。从1994年至今,石言一病不起。石言的妻子余金芬不会唱歌,她无微不至地护理着丈夫,以至于医院把她作为楷模,让护理人员 and 病人亲属们到石言病房里来参观学习。余金芬对丈夫的无限深爱一定会感动上帝的,让我们期待着又一个奇迹出现。

序

陈 辽

我和石言同志结交已整整 45 年了,对石言其人其作,算是比较了解的。

(一)

早在 1950 年,石言同志的《柳堡的故事》在南京《文艺》发表并被《新华月报》转载后,我阅读了这篇名作就知道了“石言”的名字。当时同在山东军区卫生政治部宣教科一起工作的刘述卿同志(90 年代他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告诉我,“石言”真名胡石言。抗日战争时期,胡石言任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的宣教股长,办《战斗报》,报纸编辑、刻印得极其出色,他(刘述卿)在连队当指导员,向《战斗报》投稿,因此和胡石言比较熟悉。《柳堡的故事》中的男主角李进,确有其原型人物在。我听了刘述卿的介绍后,对石言有了较深印象。但那时石言在南京,我在济南,无缘结识。

1955 年,我在南京军区后勤部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发表了两三篇评论文章后,突然接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来信。拆开一看,原来是时任文化部文艺科副科长的石言写给我的,大意是:南京军区搞文学评论的不多,得知你从事文学评论,且颇有水平,十分高兴,想和我见面。他约我在某月某日在文艺科晤谈。(原信已在“文革”中遗失)我读信后,真是喜出望外,准时去文艺科与石言同志见了面。石言时方 32 岁,体格魁梧,一表人才,英气外露,热情洋溢。两人一见如故,彼此介绍了各自的简况。以后两人又有几次交谈,我这才知道,石言的父亲就是杭州大学的著名教授、话本小说专家胡士莹先生;石言的母亲陈祿曾在中学任教,写得一手出色的旧体诗词,是位才女。他在这样的书香门

第中长大，早就爱好上了文学。他在中学时就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开始阅读巴金的《家》、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等作品。大学读了一年，1942年5月即参加了新四军。先后参加过战斗三十多次，负伤一次。他在新四军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体验，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次见面，约在1955年6月，从此以后，常相过从，很快成了知交。

1961年，江苏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收集江苏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我看到石言发表在1944年3月16日《苏中报》上的小说《子弹》。《子弹》写七班小组长冯刚，把缴获的“三八子弹”打了埋伏，塞在草堆里，因为他曾经在一次战斗中接连瞎火几颗子弹，敌人在他的枪下逃生了。“冯刚的眉心为这都气得爆出火星来了。”但是，冯刚是个纪律性很强，政治觉悟很高的战士，现在，这打埋伏的“三十三颗子弹，已经变成他心头的石头了。”“一个很舒坦、爽快的心，现在像做了贼似的惊惶”，“冯刚觉得快要闷死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冯刚还是“把子弹从草堆里摸出来，大踏步地走到连部，把打埋伏的子弹缴了公。”但是，指导员和连长很有人情味，不但没有责备冯刚，反而将冯刚上缴的新子弹还给他二十颗。冯刚也就“用从鬼子手里夺过的枪，装着鬼子兵工厂里造出来的子弹”，在一次遭遇战中，“单独地阻止了疯狂的鬼子”。他一枪一个，打死打伤了二十个鬼子，直到增援的部队上来。已经负伤的冯刚，看见从旁边冲上去的同志，“愉快地摸摸通红的流着血的肩膀，觉得骨头还没有断。”他想，“回去，我要告诉指导员，我的救命子弹已经打完了！”这篇小说写了战士的个人喜爱与军队纪律性之间的矛盾，但它不是硬邦邦地写军队纪律性压制战士的个人喜爱，而是以富有人情味的方式使两者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而且产生了歼灭敌人的良好效果。通过《子弹》，我读懂了《柳堡的故事》。李进和二妹子恋爱，在战争的年代里未被允许，李进也曾想到过离开部队，但李进还是以革命利益为重，决不当开小差的“孬种”。他霍地站起来，背起枪，说：“指导员，你放心！共产党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我还是那句老话：‘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果然，淮海战役胜利后，李进和二妹子又再见了，但部队仍要南下，他俩还得别离，李进对二妹子说：“你放心，我有哪一点对不起革命，就没有脸回来见你。”在石言看来，即使军队的纪律性、军队的根本利益，要求指战员作出放弃个人利益的决定，以至牺牲个人的生命，也仍然体现了革命的群体的人道主义。正如《柳堡的故事》中的政委所

说的：“我们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为什么不能谈恋爱，不能回家抱老婆？难道我们就不是人？我们是为了革命战争！也可以说：为了我们的妇女不再给阶级敌人蹂躏，为了工农大众，连同自己，将来都能得到真正的婚姻自由。我们这是一种牺牲，长年累月很重大的牺牲。当然这是光荣的。今后的相当时期革命还需要我们部队人员坚持下去，相信我们的同志们做得到。”这是真正的、感人的人情味！石言写的《翠莲》、《春江夜雨》、《门板》、《红丫头》、《还我头来》、《狂风暴雨日》、《珍珠》等作品，都回荡着这么一种革命的人情味的基调。

《柳堡的故事》在艺海上几经浮沉。当着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它就升浮在艺海上，令人瞩目；当着“左”倾文艺思潮在我国抬头的时候，它就被按没下去；“四人帮”猖獗时期，极左路线得势，它更遭受灭顶之灾。《柳堡的故事》三起两落（50年代初一“起”，贯彻“文艺八条”时一“起”，新时期又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一“落”，“文革”时又一“落”），的确有很多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有权威的评定者，还是少数“批评家”甚至像江青那样一句话就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命运？评论一部作品是根据总的政治思想倾向，还是只抓住一些个别细节，以偏概全，无限上纲？对于一部作品能不能由某个人任意宣布为“毒草”，随便在报刊上公开“批判”，而又不让作者和不同意见者为该作品辩护？这些，当然还不止这些，是应该从《柳堡的故事》的遭遇中作出正确的回答的。

“文化大革命”一来，石言被作为“走资派”批斗，在猪圈里养猪；我则作为“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黑干将”、“漏网右派”被下放到一个农村中学。“文革”，人与人之间相互戒备，极少往来。石言是我在“文革”中仅有的几位秘密来往的友人之一。有些老干部被“造反派”当做“走资派”整倒后一蹶不振，或在“造反派”面前低头哈腰，低三下四。石言却不是这样，他的“官”被打倒了，可是他的精气神始终没有倒。他在“文革”中昂首挺胸，风度依然，没有半点败落样子。他被迫当了“猪倌”，却把猪养得很好。在他养的猪中，一只猪得了猪瘟，病倒了，杀了；另一只猪也得了病。兽医看后，说是猪瘟病毒没有特效药，只好等另一头猪死，再杀掉。他不甘心，想努力挽救另一头猪。他加强了对病猪的护理，自己买了馒头，一点一点地喂它吃，还用各种野菜试验喂它，发现有三种野菜猪要吃，并及时给水，以增强它自己的抗病能力。还有一头猪未病，当它去吃杀掉的病猪的残血的时候，他让它去吃。石言认为，要传染它

早就染上了，而病猪的血液，倒可能有增加抵抗病毒的血清之类的东西。经过四天的努力，未杀的病猪胃口逐渐恢复了正常，小便也不黄了，到第九天，完全恢复了。那头没有病的猪经过隔离，始终未发病，而且长肥了。仅从这一事例中也可看出，石言在逆境中心气和平，仍然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做好哪怕是“猪倌”的工作。1974年，他和他夫人余金芬路过上海。当时陕西路有“黑画”展览，他说“这个展览有看头”。他俩不仅看了“猫头鹰”、“大公鸡”的“黑画”，而且对陈大羽的大公鸡特别欣赏，回到南京，特地请陈大羽画了一幅大公鸡，这是他家仅有的一幅名画。我每次去石言家里和他交谈，都从他的生活态度中获得了勇气，增强了对革命前途一定光明的信心。

(二)

“四人帮”倒台，新时期到来，石言的创作也进入了新阶段。《胡司令赴宴》、《漆黑的羽毛》、《江江的“香格里拉”》、《秋雪湖之恋》、《魂归何处》、《陪同——田红莲外传之一》、《夜来香开放的时候——田红莲外传之二》等等优秀小说，接连问世；《绘蓝图的人》、《自由平等车》等散文也备受欢迎。其中《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漆黑的羽毛》最早在短篇小说里提出必须解决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人才问题；《秋雪湖之恋》控诉、抨击了极左路线。这两篇小说不只情节引人，形象感人，而且都是振聋发聩之作。石言在新时期的创作，犹如庖丁解牛，已经进入了自由阶段。他对生活有新的发现，同时又能把这种发现艺术地加以表现，从中显现出某种生活真理。《胡司令赴宴》就是这样。他在作品中提出了如何挑选接班人的大问题。石言同志在生活中发现，一些领导人常常挑选那些“听话干部”充当他们的接班人，以致使革命事业遭受了损失。但是，对这种情况不少人却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在这种“常情”中他发现这是一个有关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大问题。在《赴宴》中通过对三个“观念很强”的党员形象的塑造，通过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石言艺术地表现了他对生活的这一发现。不仅如此，石言还在小说中显现了掩卷以后我们可以从中思索和体会到的某些生活真理。这就是：挑选接班人不只是一个挑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还有个如何挑选的问题。过去用指定的方式，固然不能挑选到真正“同党中央同群众一条心的人”做接班人；就是作品中的老汤用“示

意”的方式、“拉选票”的方式，也不可能挑选到真正“同党中央同群众一条心的人”。只有真正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用极大的努力选拔和培养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让这些同志参与各种领导工作，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实际有效的锻炼”，才能挑选到真正“同党中央同群众一条心的人”。《赴宴》在全部艺术形象、艺术画面中所显现出来的这一生活真理，恰好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后来关于挑选接班人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石言在新时期创作的小说，发现、表现、显现常常达到完美的统一。

石言是江苏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我是理论批评工作委员会主任，开常务理事会议时都在一起。除了会上倾听他的精彩发言外，我更要在会后到他的住处看望他，聆听他对文艺问题的悦言宏论。日积月累，我对新时期里的石言，逐渐产生了这么几点认识：

第一，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绝不思想僵化；他支持改革开放，但绝不搞“自由化”。石言从18岁入伍，出生入死于枪林弹雨之中。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上，有他的鲜血在。因此他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充满了热爱之情。小平同志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非常拥护。记得1979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理论批评工作会议后，回来我和他谈了会议情况，告知了他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精神。石言同志连连点头，说这个讲话好，有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出不了赫鲁晓夫，国家就可以在稳定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但是，石言同志和某些思想僵化的同志不一样，他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而且四项基本原则也会发展，譬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后一定会作出新的解释。后来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证明了石言同志这一看法是正确的。对于改革开放，石言同志尤其拥护。他身受过极左路线之害，但是，石言并不从个人利益出发看待改革开放。1983年，在《雨花》评奖会议上，我又到他住处看望他。他说：“陈辽，我们都是吃过‘左’倾路线的苦头的，因此对反‘左’，对改革开放，我们本能地欢迎和拥护。不过，既然改革开放，打开了门户、窗户，苍蝇、蚊子就会飞进来，西方国家也必然会对我们搞渗透，所以，中央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点也大意不得，放松不得。”石言同志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的。他所领导的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在新时期内成果累累，蜚声军内外，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支持改革开放，既没有思想僵化，也从不曾

搞“自由化”。这和石言同志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言传身教分不开。

第二,石言的创作,真正做到了既高扬主旋律,又坚持多样化。新时期里石言的全部作品,从艺术内容来说,都是表彰人民解放军的,写他们怎样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写他们在个人利益与军队的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怎样放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写军队里的有识之士怎样提出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怎样与军队里开始出现的不正之风作斗争;即使是写地方的,也是提出和回答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对改革开放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然而,石言的作品一点也不枯燥、单调,艺术内容上的高扬主旋律和题材、形式、风格、技巧、手法上的多样化,在石言那里是统一的。石言的作品不只是从不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而且也从不踩着自己的脚印走。《秋雪湖之恋》被认为是《柳堡的故事》的姐妹篇,但无论是主题,还是形式、风格、技巧、手法两者都大不一样。《柳堡的故事》是热烈的,抒情的,给人以欢乐感;而《秋雪湖之恋》却是感伤的,哲理的,读后有一种苍凉感。至于他在新时期创作的其他作品,也是一篇一个样,这和某些作家总是不断地重复自己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石言一辈子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作品,但他的现实主义是开放的现实主义,现代的现实主义,吸收了外来的手法和技巧,这在他新时期的创作中尤为明显。石言在参加革命前,在少年和青年时期曾阅读过多种外国小说,从15岁起他就写过小小说、侦探小说、美国式的心理小说。参加革命后,他写出的《子弹》(石言说它是他的“真正的处女作”),其中对冯刚把缴获来的子弹打埋伏后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历历如绘,入木三分,不能不说与他写过美国式的心理小说有关。著名作家林淡秋曾为《子弹》写过颇为赞赏的短评。《柳堡的故事》,在50年代初,也是篇开放的现实主义之作。它和当时大量出现的以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写出来的革命题材的作品是不一样的。不只题材新颖,而且创意独特,以革命的人情味吸引了千百万读者。石言在新时期创作的小说,既是开放的现实主义之作,又是现代现实主义之作。就其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人物和事件而言,它们是充分现实主义的,但就它们广泛吸收、运用了外国现代小说的手法、技巧而言,它们又是相当现代的。认真读过《漆黑的羽毛》的读者,都会察觉到作家吸收、运用了“黑色幽默”的手法,但它却被现实主义融合和融化了。也就是说,石言不是像有些作家那样生搬硬套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手法和技巧,而是

真正地吸收其优长,抓住其“合理的内核”,化用过来成为自己的东西。

以上三点,在石言那里是很突出的。它们代表了军队作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作主流。可以说,凡是在军事创作中取得了显著成就的作家,在创作思想上,在主旋律和多样化的统一上,在发展现实主义上,都有与石言上述三点共通的东西。石言在1989年的一则题词上说:“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更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不会消沉,不会惶惑,只要我的所作所为有益于提高人类的素质。”因为他是爱国主义者又是“人类主义”者,所以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支持改革开放,弘扬主旋律,又搞多样化,采用现实主义,而又广采博收外国文学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其目的都是为了“有益于提高人类的素质”。

(三)

石言同志是著名作家,但他从来不是专业作家,而是业余作家。他自1955年1月担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副科长后,当过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团长,前线话剧团团长。“文革”结束后,当文化部创作室主任。他还一度负责南京军区的《星火燎原》的征文工作。他的主要工作一直是组织、指导和帮助别人写作,起园丁的作用。半个多世纪来,他始终在军事文学领域里打滚,对我军的军事文学不只是熟悉,而且确实有研究。说起我军的军事文学来如数家珍,对它的历史、现状和将来,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我曾多次敦促他把这些看法写出来,他总是“唯唯”。1986年,石言终于在《解放军文艺》9月号上发表了论文《“中子星”——关于发展和深化中国军事文学的对话》,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发展和深化中国军事文学的意见。他认为,从原始人类起,人和剑齿虎搏斗,这个部落和那个部落械斗,为生存而斗争,所以好战是人的本性。厌战反战也是人的本性,但在人性中形成得较晚,是人的价值不断提高的结果。战争是一种劳动,革命战争更是一种崇高的劳动。这是一种流血的、代价极高的劳动,一种高强度的、要求参战者在各方面都发挥到极致的劳动。军事劳动有的破坏极大,有的在破坏之后成果极大。中国的革命战争为人民赢得了—个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的新中国!为这样的战争作出了牺牲和贡献的人怎能不自豪,享受到牺牲胜利成果的人怎能不欢唱!石言还认为,中国人最早懂得反战,懂得用战争来制止战争。“止戈为武”,这个“武”字拆开来便是“止戈”二字。